



# 历史时期插花地的基本概念讨论

杨 斌

(贵州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处、喀斯特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无论历史时期还是当前,插花地都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可关于插花地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却有很大的分歧,内涵不清,分类逻辑混乱,从来就没有统一的认知,不少学者将其等同于飞地(enclave 或 exclave)是极为偏颇的。有的学者认为北方民族的瓯脱之地为插花地的一种,也是不科学的。插花地是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区域内的各个政区(或行政区划)在形成、发展和变迁过程中归属明确但经界不正之地的总称,包括飞地和犬牙之地两种基本类型。

**关键词:**历史时期;插花地;飞地;穿插交错或经界之地;犬牙之地;华离之地;瓯脱之地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5-0150-05

## 一、问题的提出

插花地不仅是“历史时期的一种普遍的区域社会现象”<sup>[1]</sup>,在现今的行政区划中亦极为普遍。在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各地的勘界档案资料中,插花地也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若干理论与实际都充分证明,插花地的广泛存在,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行政管理等都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插花地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999 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和笔者分别撰文讨论了战国时期的插花地问题<sup>[2]</sup>和历史时期西南地区的插花地问题<sup>[3]</sup>,插花地问题自此进入了不少学者的研究视野。迄今为止,已发表的与插花地有关的研究论文已有 20 余篇,可在插花地的基本概念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程度的分歧。不少学者将其等同于飞地(enclave 或 exclave),是极为偏颇的。有的学者认为北方民族的瓯脱之地为插花地的一种,是对插花地内涵不够了解。因此,很有必要对插花地的基本内涵再作一下检讨,以推动插花地问题研究的深入开展。

## 二、两种不同观点点评

迄今为止,关于插花地的基本内涵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插花地实际就是飞地;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插花地是各种穿插交错或各种经界不正之地的总称。

认为插花地实际就是飞地的学者主要有史念海、傅辉、吴滔、马琦、韩昭庆、孙涛等。在《战国时期的“插花地”》一文中,史念海先生对插花地的基本内涵作了这样的解释:“战国时各国的疆域并不是各据一方整整齐齐的,而是相互的错乱。这种相互错乱的情形也不是通常所说的犬牙相错。因为犬牙相错只是形容接界的地方不大整齐,而那时候说不定这一国的土地会孤伶伶地伸入到另一个国的腹地、有时候竟离开本国有千百里远的路程”。显然,史念海先生所指的插花地实际就是飞

\* 收稿日期:2013-04-22

作者简介:杨斌,历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喀斯特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贵州与云南、四川、重庆交界处插花地问题研究”(41161023),项目负责人:杨斌;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科研项目“湘黔交界地区插花地问题研究”,项目负责人:杨斌。

地。当然,史念海先生还不敢充分肯定插花地这一提法。在《战国时期的“插花地”》一文中,他还写有这样一段文字:“插花地这个名字虽不是我杜撰的,不过用来说明战国时期的疆界情况,终嫌有点生疏,在没有更恰当的名词以前,只好冒昧地采用了。”<sup>[2]</sup>马琦、韩昭庆、孙涛也明确地将插花地等同于飞地。在《明清贵州插花地研究》一文中,他们是这样定义插花地的:“插花地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飞地,指某些行政隶属关系属于一地,但实际位置却处于另一地的包围圈中,犹如孤岛一般的聚落或政区”<sup>[4]</sup>。吴滔虽然注意到了插花地与飞地的不同,“传统社会中的插花地与从西方语境衍化来的‘飞地’相比,情况更为复杂,外延亦更加广阔”,但他还是将插花地定性为飞地。在《“插花地”的命运:以章练塘镇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他是这样定义插花地的:“插花地又称‘扣地’、‘嵌地’等,从性质上说,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的‘飞地’。所谓‘飞地’,主要是针对国与国之间领土结构而言的,特指一国位于其他国家境内或被其他国家领土所隔开而不与本国主体相毗邻的一部分领土”<sup>[5]</sup>。傅辉虽然没有给插花地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从其有关论述<sup>[1][6]</sup>可以看出,他的插花地内涵实际也指的是飞地。在《插花地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处理方法》一文中,他是这样解释插花地的:“插花地亦称飞地、嵌地、寄庄地等,此外,在不同地域尚有其它称谓,如河南民国《林县志》写道‘疆界毗连大率犬牙此处彼入不足为奇,乃竟有甲县之地插入乙县境内,四面皆系邻疆,中间若干村户遥寄孤悬,与本管县不相连属,则所谓插花地也,俗称为扣地也。’”<sup>[1]</sup>

认为插花地是各种穿插交错或各种经界不正之地的总称的学者主要有杨斌、郭舟飞等。在《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和《民国时期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清理拨正研究》两文中,杨斌将插花地定义为“是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区域内的各个政区(或行政区划)在形成、发展和变迁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穿插交错或各种经界不正之地的总称”<sup>[3][7]</sup>。郭舟飞虽然没有提到“总称”二字,但他的插花地内涵实际也指的是各种穿插交错或各种经界不正之地。在《由武汉“插花地”看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一文中,他将插花地定义为:“是指两个区域间要么没有明确的归属,要么就是两个单位地界相互穿插或分隔而导致零星分布的土地。如两个单位的土地互相楔入对方,形成犬牙交错的地界;或一个单位的土地落在另一单位占地范围内。”<sup>[8]</sup>需要指出的是,郭舟飞的插花地概念虽然也是一个“总称”,但其插花地定义仍有欠妥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没有明确归属”的土地不能列入插花地范畴。因为插花地是行政区划区域划分的必然结果,连区域界线都未划清的土地自然不能列入插花地范畴;其二,“单位”一说不够妥当。虽然各具体单位之间的地域划分也会产生插花地,但将一个行政区也统称为一个“单位”的话,就显得有些不够妥当。

上述两种观点到底那一种更为准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讨论一下插花地的基本类型。

插花地是中国本土术语,国际术语中没有插花地这一称谓(英文词典里查不到能准确表达其语义的单词或词组)。在中国,插花地虽然早于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就曾专题研究过战国时期的插花地问题<sup>[2]</sup>),可插花地这一称谓,直至清道光年间才正式出现。道光二十八年(1848),安顺府知府胡林翼在奏请拨正境内插花地时即言:“查贵州所谓插花地者,其情形约略有三种。”<sup>[9]</sup>这是笔者查到的关于插花地称谓的最早文献记录。光绪十一年(1885),贵州巡抚李用清在奏酌拟清理插花章程时亦言:“插花之名,为经传载籍所未见,惟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守安顺时论之最详。”<sup>[10]</sup>

胡林翼将插花地归纳为“华离之地”、“犬牙之地”和“瓯脱之地”三种类型:华离之地者,“如府厅州县治所在此,而所辖壤土乃隔越他界,或百里而遥,或数百里之外”;犬牙之地者,“如二壤本属一邑,中间为他境参错,仅有一线相连”;瓯脱之地者,“如一线之地插入他境,既断而复续,已续而又绝,绵绵延延至百十里之遥”<sup>[9]</sup>。根据胡林翼的论述,我们可以将插花地的三种类型图示如下(见图1、图2、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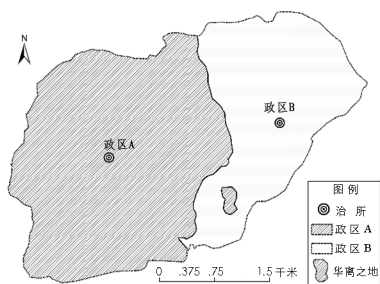


图1 华离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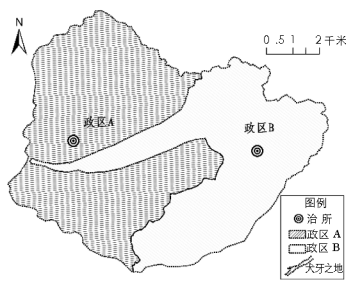


图2 犬牙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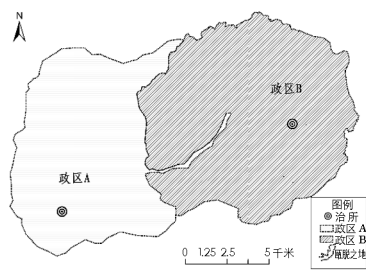


图3 瓯脱之地

“瓯脱”一词为匈奴语，最早出现于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关于“瓯脱”的内涵，历来争论颇大，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的解释：一为“边界上的防卫设施”或“界上屯守处”，二为“双方之间的交接地带”或“弃地”，三为“官号”，四为“地名”。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学者又对“瓯脱”的内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经过讨论，学者们虽然否定了“官号”和“地名”之说，但在另外两说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学者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如何星亮<sup>[11][12]</sup>、张云<sup>[13]</sup>、陈宗振<sup>[14]</sup>等），有的学者又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如刘文性<sup>[15][16]</sup>等），还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应是“匈奴和东胡游牧民族所创建的社区的组织和机构”或“游牧时期的宿营地或者是游牧生活中临时居住处”或“领地”（如杨茂盛<sup>[17]</sup>、郭卫红<sup>[17]</sup>、胡·阿拉腾乌拉<sup>[18]</sup>、胡和温都尔<sup>[19]</sup>等）。

可见，实际上，“瓯脱”之意本来与插花地并无直接关系，就是认定其中一种观点为“弃地”、“无人地”之说，也与归属明确只是疆界不正的插花地概念相左。所以，严格讲，“瓯脱”就是认同为“无人地”，也与我们谈的插花地并无直接关系，应是历史地理中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况且胡林翼将“瓯脱”一词引入插花地后，其表述的意义已经完全与原来的“无人地”意义不同了，更与其它三种解释无关。

胡林翼将“瓯脱之地”作为插花地的一种基本类型，虽然得到了后人的广泛认可，但具体内涵却演变成了“飞地”，即胡林翼的“华离之地”。光绪十一年（1885），贵州巡抚李用清在奏拟拟清理插花章程时，即将“瓯脱”定义为：“治所在此而所辖地土隔越他界，或百里，或数百里，并无一线相通者”<sup>[10]</sup>。可见，李用清的“瓯脱”实际相当于胡林翼的“华离之地”。光绪三十一年（1905），贵州巡抚林绍年在拟办插花时，已明确地将“华离”、“瓯脱”视为同一种插花地类型<sup>[10]</sup>。《桐梓县志》有如此之记载：“惟即全县计之，县城地势偏南，未能宅中，以故六、七两区地段，有与綦、南插花者，有瓯脱于綦、南界内者，如陈家坝、二磴岩、上青山、下青山、柏枝坝等处，比比皆然”<sup>[20]</sup>。显然，《桐梓县志》的“瓯脱”实际也相当于胡林翼的“华离之地”。民国二十九至三十五年（1940—1946），国民政府对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诸省交界地区的插花地作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清理拨正，从这次清理拨正的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出，“瓯脱”也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其基本内涵与胡林翼的“华离之地”也完全相同。如松桃县政府在给贵州省第六行政督察区行政会议的提案书中，就提到了如下典型案例：“湖南永绥县螺丝壩瓯脱于本县盘石乡境内，四面皆属本县管辖，且该地业已超过两省交界处，在本县管辖地区内四五华里之遥，确系飞地”<sup>[21]</sup>；贵州省政府在回复内政部“准咨以四川省政府咨拟将秀山县麻阳街划隶本省松桃县一案咨复查照由”的公函中也提到：“尚有四川省西阳县之黑獭堡、綦江县之青羊市、早渡河、官田市、扶欢坝，本省沿河县之六道界、务川县之苏家坝、桐梓县之陈家坝、刘罗坪、九龙沟、九条龙、青山等地带，或为瓯脱，或为插花，其阻碍施政情形，与麻阳街正复相同”<sup>[22]</sup>”。

可以看出，作为插花地的一种基本类型，“瓯脱”的内涵无论作何理解，均与北方民族的“瓯脱”有本质的不同。

胡林翼所述的三种插花地类型，内涵虽然十分清楚，但其所作的类型划分与所给的类型称谓不

尽科学合理。主要有以下两点依据：

其一，“华离之地”实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飞地，而飞地不仅是国际通用名词，也为国内学界广为接受。民国时期，飞地已较多地出现于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因此，本文主张用“飞地”这一通用称谓更好。

其二，“犬牙之地”与“瓯脱之地”密不可分，有犬牙之地必有瓯脱之地，有瓯脱之地则必有犬牙之地。二者实际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可以统一为一种类型。根据中国历史上划分行政区划的两大基本原则：“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原则（所谓“山川形便”，就是以天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而所谓“犬牙交错”则是基于统治者的需要，人为地打破自然地理区域，使行政区的界线如同犬牙一般相互交错<sup>[23][24]</sup>）。本文认为统一命名为“犬牙之地”较为妥当，不仅形象生动，而且有历史依据。

基于以上两点依据，笔者认为，飞地和犬牙之地是插花地的两种基本类型。尽管从不同的角度还可以将插花地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根据政区层级的不同，可以将插花地划分为国家之间的插花地、一级政区之间的插花地、二级政区之间的插花地、三级政区之间的插花地等；根据插花地成因的不同，可以将插花地划分为历史插花地、经济插花地、政治插花地、民族插花地等。但就插花地的基本形状看，无论哪一种类型的插花地，都无外乎飞地和犬牙之地两种。正因为如此，明清至民国时期的贵州官方文献，都没有将飞地排除于插花地之外；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勘界工作，也没有将飞地排除于插花地之外；从插花地穿插交错的字面意义上理解，飞地亦应包含于插花地中。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飞地更便于鉴别，故常被单独使用。

将插花地分为飞地和犬牙之地两种基本类型，实际已是清末以来的通行做法。光绪三十一年（1905），贵州巡抚林绍年在拟办插花时即言：“黔省郡县，悉因元、明卫、所、土司及剿抚蛮苗开辟，地土华离瓯脱，犬牙相错，俗名‘插花’”<sup>[10]</sup>。在这里，林绍年已明确地将插花地区分为“华离瓯脱”和“犬牙相错”两种。民国十九年（1930），国民政府颁布的《省市县勘界条例》第七条规定：“固有区域太不整齐，如插花地、飞地、嵌地及其他犬牙交错之地，实于行政管理上甚不便利时”，应“变更编制，重行勘议界线”<sup>[25]</sup>。这里的插花地实际是一个总称，包括“飞地、嵌地及其他犬牙交错之地”。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勘界工作，实际也是将插花地区分为飞地和犬牙之地两种基本类型的。如 1996 年签订的《四川省人民政府与贵州省人民政府联合勘定的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第七条就如此规定：“两省行政区域界线勘定以后，双方在边界线两侧的‘飞地’，相互插花的耕地、林地、水面、荒山、生产生活设施等自然资源和人工设施，以及交通运输、工商、税务经营管理的权属、隶属关系不变，仍维持勘界前的现状，已经达成协议、协定的仍按有关协议协定执行。任何一方不得扩大插花地的范围，也不得往插花土地上移民及新设立基层政权组织。在自己的插花地上兴建或扩建永久性生产经营或生活设施，需征得所在界线一侧县以上人民政府的许可”<sup>[26]</sup>。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飞地只是插花地的一种基本类型，将插花地等同于飞地的做法是十分欠妥的。

### 三、结 论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做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将插花地定义为“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区域内的各个政区（或行政区划）在形成、发展和变迁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穿插交错或各种经界不正之地的总称”<sup>[3][7]</sup>是比较恰当的，包括飞地和犬牙之地两种基本类型。胡林翼虽然没有给插花地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从其对插花地的类型划分可以看出，他的插花地内涵实际指的也是各种疆界不正之地。清末以来的插花地概念实际也是一个总称，有时虽然与飞地（或“瓯脱”）并列，只是因为飞地更便于鉴别而已。

第二，将插花地等同于飞地的做法是极为不妥的，因为插花地包括飞地和犬牙之地两种基本

类型。

第三,不能将北方民族的瓯脱(otar)与插花地中的“瓯脱”相混同,因为二者的基本内涵有本质的区别。

第四,没有明确归属的土地不能列入插花地范畴,因为插花地是行政区划区域划分的必然结果,连区域界线都未划清的土地自然不能列入插花地范畴。

第五,将插花地翻译为 enclave 或 exclave 也是不妥的,因为 enclave 或 exclave 的内涵均为飞地,而飞地只是插花地的一种基本类型。《牛津地理学词典》<sup>[27]</sup>是这样解释这两个单词的:Enclave 为:(1)A small area within one country administered by another country. West Berlin was an enclave within Eastern Germany between 1945 and 1990. (2)A part of a less developed economy which is regulated by foreign capital and has few linkages with the national economy. Free trade zones may be considered as economic enclaves. Exclave 为:A portion of a nation which lies beyond national boundaries, as with West Berlin between 1945 and 1990. This type of territory is also an enclave in terms of the host country.

#### 参考文献:

- [1] 傅辉. 插花地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处理方法[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2):20-28.
- [2] 史念海. 战国时期的“插花地”[G]//史念海. 河山集·第7集[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504-519.
- [3] 杨斌. 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35-40.
- [4] 马琦,韩昭庆,孙涛. 明清贵州插花地研究[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22-128.
- [5] 吴滔.“插花地”的命运:以章练塘镇为中心的考察[J]. 史林,2010(3):86-98.
- [6] 傅辉. 河南插花地个案研究(1368-1953年)[G]//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 历史地理:第19辑[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9-47.
- [7] 杨斌. 民国时期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清理拨正研究[J]. 地理研究,2011年(10):1921-1929.
- [8] 郭舟飞. 由武汉“插花地”看地方政府公共管理[J]. 科技创业月刊,2009(9):78-83.
- [9]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校勘.(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三)[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489-493.
- [10]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校勘.(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四)[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778-779.
- [11] 何星亮. 匈奴语试释[J].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1):3-11.
- [12] 何星亮. 匈奴语“瓯脱”再释[J]. 民族研究,1988(1):101-108.
- [13] 张云.“瓯脱”考述[J]. 民族研究,1987(3):67-70.
- [14] 陈宗振. 古突厥语的 otar 与“瓯脱”[J]. 民族研究,1989(2):55-63.
- [15] 刘文性.“瓯脱”释[J]. 民族研究,1985(2):52-61.
- [16] 刘文性.“瓯脱”再认识——与张云、何星亮同志商榷[J]. 西北民族研究,1988(2):276-282.
- [17] 杨茂盛,郭卫红. 中国近年“瓯脱”研究综述[J]. 社会科学辑刊,1995(2):108-112.
- [18] 胡·阿拉腾乌拉著,高玉虎译. 简论“瓯脱”的起源与发展[J]. 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1990(3):81-86.
- [19] 胡和温都尔. 瓯脱义辨[J]. 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6):74-76.
- [20] 犹海龙,侯树涛,赵元隽纂辑,张瑞琪,龙砺乎,李明方,夏永忠校点.(民国)桐梓县志[M]. 1987.
- [21] 黔川两省关于省界问题的调整等报告(1942-1949年). 贵州省档案馆. 档案全宗:M8-1-3032.
- [22] 内政部四川贵州省府关于黔川两省瓯脱插花报告和批复. 贵州省档案馆. 档案全宗:M8-1-3030.
- [23] 李晓杰. 体国经野——历代行政区划[M].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126.
- [24] 周振鹤,李晓杰.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87.
- [25] 省市县勘界条例. 贵州省档案馆. 档案全宗:M8-1-2875.
- [26] 赤水市民政局. 一九九九年市勘界办川黔行政区域边界卷.
- [27] 梅休(Mayhem, S.). 牛津地理学词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51,163.

责任编辑 张颖超